

熊赐履为什么写诗骂自己?



熊赐履

忠肝义胆 帝王之师

熊赐履是崇祯八年(1635年)生人,父亲熊祚延是明末秀才。崇祯十六年,张献忠横扫湖北,熊祚延组织团练反抗,被流寇所杀。熊赐履没了父亲,全靠母亲拉扯大。他闭门苦读,顺治十五年(1658年)高中进士,光耀门楣,康熙四年(1665年)升任内翰林弘文院侍读。

清朝当时没有设立内阁,而是分立内国史院、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,简称内三院,后来又把翰林院合并进来,分别称作内翰林国史院、内翰林秘书院和内翰林弘文院。内翰林弘文院的职责是议论古今政治得失,给皇帝和皇子讲课。熊赐履推崇理学,曾著《闲道录》抨击王阳明的学说,提倡“明善”“主敬”等宋儒观点,思想上比较复古。

宋儒的忠义精神,确实影响了熊赐履,使他面对看不惯的事情,可以挺身而出,仗义执言,不畏惧权势。正是《闲道录》完稿那年——康熙六年,他大胆上奏:“王道必以正心为本。”批评鳌拜等四大辅臣的做法是祸国殃民,破坏社会稳定,进而指出要依靠儒学,使满汉团结。鳌拜厌恶他妄言朝政,要治他的罪,康熙帝却非常欣赏他的意见,表示:“彼自陈国家事,何豫汝等耶?”硬是将他给保了下来。

鳌拜集团覆灭后,熊赐履升任内翰林国史院学士。内翰林国史院的职责是撰拟表章、编纂皇帝的言行实录,这就使他和皇帝的关系更近了。康熙九年八月,内三院被并作内阁,又重新拆出翰林院,由熊赐履担任掌院学士。这以后的几年里,熊赐履深知皇帝年幼,尚可塑造,因此竭力讲学,千方百计给皇帝灌输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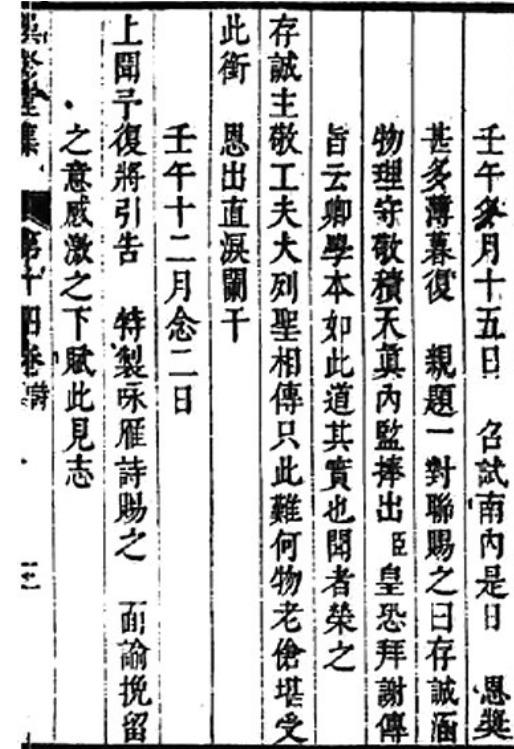
康熙十二年,朝廷决计撤藩,熊赐履积极辅佐皇帝平叛,韦小宝听到的那篇《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》就是他所拟的。敕文要求老百姓各按职业,并不株连,有能擒斩吴三桂者则予以重赏,有率众来降者则论功叙录,从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吴三桂的势力。康熙十四年,以熊赐履素有才能,居官清慎,升他做了武英殿大学士,官居正一品。

金庸的《鹿鼎记》里,叙韦小宝回扬州办事,听闻吴三桂举兵造反,叫师父诵读解说朝廷斥责吴三桂的诏书。张勇、赵良栋、王进宝、孙思克,以及天地会的李力世等在侧旁听,均想:“圣旨中只说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,斥责吴三桂忘恩负义,不提半句满汉之分,也不提他如何杀害明朝王室,可十分高明,好让天下都觉吴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该。”

这一道诏书,历史上称作《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》,实际作者是当时翰林院的掌院学士熊赐履。正是他引导康熙帝躬行儒学,集中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,后来又被选中辅导皇太子,可见康熙帝对他的器重之深。他的《澡修堂集》里,有一首诗曰:“存诚主敬工夫大,列圣相传只此难。何物老伦堪受此,衔恩出直泪阑干。”就是康熙帝赐予他一副对联,圣恩浩荡,让他这个“老伦”感动得涕泪交流,因此而作了这首诗的。

按说“老伦”之谓,乃是南方人的脏话,比如章炳麟的《新方言》就解释道:“今自镇江而下,浙闽沿海之地,无赖相呼曰老伦。”熊赐履是湖北孝感人,此前一度蛰居江宁。江宁是南京的旧称,和镇江离得很近。他以“老伦”自居,那就好比是北方人骂“老王八蛋”,非但不文雅,兼且不自重。

一个人要感谢圣恩,无论如何谦卑,总不至如此自辱。熊赐履却是当真做过一件缺德事,结果被人揭发,弄到革职出京,因之自称“老伦”倒是不算苛责。



熊赐履《澡修堂集》第十六卷

误拟票签 五内俱焚

其实撤藩之前,熊赐履持的是反对意见。他知道历史规律,撤藩则三藩皆反。但是皇帝坚决撤藩,儒家的忠君爱国之念,激发了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,让他义无反顾,支持皇帝。这是儒家精神中追求道德完美的一面使然。

虽然人无完人,但是儒家,特别是宋儒,就偏偏强调做完人。熊赐履之所以做出一件缺德事,害得他几乎身败名裂,恐怕正是和这种追求完美的执念有关。

他所做的那件事,就是康熙十五年(1676年)的嚼签案。时值三藩军势的膨胀期,西南失守,天下震动,而明朝宗室和郑经集团则打算浑水摸鱼。各地急奏不绝,内阁的票拟匆促,就常常出错。所谓票拟,是指内阁大学士先读奏章,将建议写到小纸片上,称作票签,夹在奏章之中,进呈皇帝参考。康熙朝的内阁由四殿二阁构成,四殿是中和殿、保和殿、文华殿和武英殿,二阁则是文渊阁和东阁。四殿二阁,满汉各一,合计十二个大学士。十二人都是饱学鸿儒,但是文无第一,相互间不免有竞争情绪。保和殿大学士杜立德,年逾花甲,经常有糊涂之态,让事事情细、追求完美的熊赐履很不满意。可是那年七月,熊赐履却把陕西总督哈占“报获盗犯、开复疎防等官”的票签给弄错了。

哈占所言“开复”是要将以前被免职的官员复职,熊赐履的票拟则是:“三法司核议具奏。”意思是说刑部、大理寺和都察院会同审理。三法司核议,这是朝廷处理重大案件的举措,比如死罪中需要处以斩刑、绞刑,在京的才交由三法司会审确认。哈占说人家捕获盗犯,该当官复原职,熊赐履给皇帝的建议却是从重议罪,简直莫名其妙,全不沾边。

康熙帝读到票签,付之一笑。他早就习惯了内阁的误拟,一直秉承儒家的精神,宽仁以待,本来该是罚俸的事,往往一句:“他们心乱了,本无大事。”就不再追究。他看到票签,照旧只是问了一句:这是谁人所拟?当个笑话,无伤大雅。熊赐履却是五内俱焚。

执念太深 铸成大错

大凡自矜自高之人,最难以容忍和接受的,便是承认错误。何况熊赐履素以“帝师”和“楷模”自诩,看不惯别人出错,更不肯变成和别人一样。因此他慌急之下,居然就动了邪念。

原来内阁的票签,纸条很小,有时不便署名。康熙帝退回票签,众人要第二天查对原签(底稿)才知道是谁所拟。结果次日五鼓,熊赐履便赶到内阁,命人取来原签,居然将原签嚼了咽了。又想到杜立德是个老迈糊涂的人,索性取来杜立德的一条原签,撕去一截,将错签誊到上面,打算嫁祸给他。

熊赐履做完这事,等到杜立德进来,便迎上去说:“老先生昨又错批了本了。”没想到杜立德这时候竟一点儿不糊涂了,看罢只道:“昨日不曾见此,是何缘故?”立刻招人查问,何以只有这一签短去一截?这时,保和殿的满族大学士索额图从旁说道:“这容易。查昨日几本、几原签,即可知是谁错。”一查之下,发现熊赐履缺了一签。熊赐履只好硬着头皮,怒道:“这样,难道原是我作弊不成!”双方争执时,突然有人出头指认熊赐履。原来此人昨晚去亲戚家丧事守夜,来得更早,躺在炕上休息时,亲眼看见熊赐履翻阅原签,取了一条咽下。

熊赐履至此无话可说。众人将事情交至吏部,康熙帝没有办法,只好秉公处理,下旨将他革职,后来又说:“熊某之德何可忘?我至今晓得些文字,知些道理,不亏他,何如有此。”

其时,吴三桂军队杀进湖北,隔长江和清军对峙。熊赐履不敢返家,蛰居江宁。江宁有个织造局,负责向宫中供应丝织品,管事者称作郎中。当时的江宁织造郎中,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。曹玺揣摩上意,格外关照熊赐履,两人往来颇密。曹玺死后,江宁民众把悼念他的诗词结集出版,作序者就是熊赐履。后来康熙帝巡视江南,果然特别召见熊赐履,并给他题了“经义斋”三字匾额,至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又让他回朝担任礼部尚书,四年后调任吏部尚书。

存诚主敬 老伦自新

熊赐履重回朝廷,如获新生,自然是如履薄冰,兢兢业业,坚决以儒家的美德自律了。至康熙三十八年,他奉命教育太子,以“东阁大学士”的资格,再一次列席内阁(东阁,是太子读书的地方。太子的住处称作东宫)。推本溯源,这都是他当年向康熙帝倡导儒学之功。师恩深重,换来康熙帝的宽仁大量,可说是因果相生。

康熙四十一年(1702年)冬月十五日,康熙帝召见熊赐履询问疑难,很是满意,当晚亲题了一副对联给他,派内监捧出。联曰:“存诚涵物理,守敬积天真。”又传旨道:“卿学本如此,道其实也。”

存诚守敬,其实就是存诚主敬,意指恪守诚信,是宋儒的律身之本。熊赐履诗中的“存诚主敬工夫大”一句,便是由此联而来。第二句“列圣相传只此难”则是他本人的切身感受。其实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关键是犯错以后,是不是知道廉耻,能不能悔过自新。第三句“何物老伦堪受此”以“老伦”自比,虽然失之俚俗,倒确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,视作性情流露的第一反应,亦无可厚非。末一句的“出直”是“直出”倒装;“阑干”则是“纵横”之意。所谓“泪阑干”者,就是老泪纵横,涕泪交流。

熊赐履捧着皇帝的褒奖之联,衔恩直出,又是惭愧,又是欢喜。所惭愧的,自然是昔年做下的缺德事。所欢喜的,则是他正视了错误,努力自新,最终再次赢得了皇帝的器重,这一生毕竟无愧于儒家精神。他作诗时所流下的泪水,是足以洗刷他这二十几年来所积压的憋屈感了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